

翻译与解释学

——论伽达默尔的翻译理论

黄小洲

摘要 翻译问题在西方解释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出现为翻译向哲学层次的跃升提供了思想支撑。翻译具有神话学的起源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根基。翻译在本质上是理解者的意义在新的语言中开显出来的一种本体论行动。在翻译中,同一与差异、忠实与自由、熟悉与陌生、他者与自我、异国与母邦、古代与现代、潜意识与显意识、生与死,等等,都存在一种辩证法的紧张关系。从解释学伦理学的角度看,翻译涵盖了谦逊、平等、对话、文明、教化、发展、和谐等交往的核心价值,翻译往往也成为启蒙新民、拯救国难、振兴民族、创新文化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翻译;解释学;辩证法;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 B089.2;H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5)02-0086-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XZX012)

翻译(translation/Übersetzung)问题在西方解释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当代解释学大师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都认为,Hermeneutik(解释学、诠释学、阐释学、释义学)在词源学上就蕴含翻译的维度。在当代翻译理论界,人们通常把斯坦纳的巨著《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誉为当代翻译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实他在此书中开篇高举“理解即翻译”的理论大旗就来自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可以说,是伽达默尔把翻译问题从理论上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因此,单继刚的《翻译的哲学方面》把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列为首位是有道理的^[1](P5,37)。那么,翻译问题如何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获得源发性的重要地位,甚至有可能发展成为一门“翻译解释学”,是一个研究西方解释学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翻译:从实践走向解释学

翻译是人类历史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几大文明古国对翻译活动都有明文记载或诗意表达。按照常识来推理,人类应该是先有大量的翻译实践,然后才逐渐过渡到对这些历史事实进行理论反思和总结的阶段。因此,人类对翻译的理解也符合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路线,即从历史客观现实的实践走向理论的凝练与提升。众所周知,古希腊古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在这里,地中海不是阻隔人们的藩篱而是互通有无的纽带。亚欧非不同文明通过地中海交汇互渗,结出累累硕果,翻译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所以,这种独特的地理特点使西方文明在源头上就是一种海洋文明与翻译文明。在东亚,由于华夏中原的儒家文化长期居于正统地位,对外的翻译交流不仅带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偏见,也带有文化的歧视。因此,连带翻译本身也是被歧视的。在中国,要打破传统儒家思想对翻译的贬抑,还需要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外来思想的传入,尤其是西方的现代解释学。

(一) 西方传统翻译实践的局限

在某种意义上,西方文明是一种奠基在翻译之上的文明。作为西方世界的第一个科学家和哲学家,

泰勒斯也是一位隐秘的翻译家,是他把古埃及的几何学和古巴比伦的天文学译介进古希腊文化。同样,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思想中也有翻译的踪迹。随着古代罗马帝国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罗马人通过大量翻译古希腊文化的宝贵遗产充实了自身。由此,西方的文明由古希腊语改说拉丁语。与基督教在西方传播相伴随的是《圣经》的翻译,例如圣·杰罗姆主持翻译拉丁文《圣经》,无疑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

在中世纪,西方人通过对阿拉伯文化的翻译了解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从而改变了基督教哲学的理论走向。对古希腊罗马文明典籍的翻译,极大地助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中国文明的热情与翻译,同样推动了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可见,西方文明始终有着丰富的翻译经验与实践底蕴。然而,尼采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罗马人,激发他们的是占领一切,事实上,他们翻译别国的作品就是‘占领’,不但去掉历史的东西,还加进对当代的暗示和影射,删去原诗作者的姓名,代之以自己的姓名,而无剽窃之嫌。”^[21](P109)可以说,这是一种“暴力的翻译实践”,显然是一种不足与局限。这种不足与局限性在不同的时代里时隐时现,或强或弱。

尽管西方传统历史上不乏翻译大家,例如西塞罗、马丁·路德等,但遗憾的是,翻译更多作为一种操作技巧而不是一门系统性的、理论性的、学科性的“学”。即使传统翻译大师们偶有翻译思想表露,但大多集中在具体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等比较狭窄的论域中,局限性十分明显,即显得偶发随意、散漫不羁、支离破碎,缺乏普遍与深度的哲学反思。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后才有了质的飞跃。1960年,伽达默尔发表被誉为西方解释学之圣经的《真理与方法》,其中已经蕴藏着一门翻译解释学的基本构架。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翻译研究在西方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它常被称为翻译科学(science of translation)、翻译学(translatology)或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二) 中国传统思想对翻译的贬抑

中国思想里有贬抑翻译的文化传统,这与夷夏之辨密切相关。儒家正统强调,华夏居于文明的尊贵中心,周边蛮夷之族则落后野蛮。因此,尽管远在周王朝时代我们国家就设立了翻译官,但他们只是负责处理蛮夷外交事务、传递王者之言的小官员,古人称之为象胥、舌人、寄、象、狄鞮、译等,可以说:“在历史上,‘舌人’的工作并不高贵。”^[31](P3)中国古代文献《礼记·王制第五》对夷、狄、戎、蛮等四方少数民族的描述是:披发文身,额头刺青,足趾向内相交,茹毛饮血,不吃熟食,穿鸟羽、披毛皮、住洞穴,十足的野蛮状态。《国语·周语中》记载说:戎狄之人,蒙昧轻贱,贪婪无礼,血气不治,毫无仁义教化,如同禽兽一般;他们在进贡时等不及祭祀的牲体烤出香味就坐在宫门之外,朝廷只好派翻译官把未熟的祭品交给这些野蛮人。

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孟子则更为直接地主张:“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这是儒家尊王攘夷、用夏变夷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而翻译作为与蛮夷之族打交道的活动自然遭到儒学的鄙薄。因此,先秦两汉时期难得看到重大的翻译作品及翻译反思。中国传统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主要集中在佛经的翻译上,尽管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说,主张直译,鸠摩罗什主张意译,玄奘有五不翻说,但是都一直被儒学所贬抑。到了宋代,儒学重新复兴,佛经翻译就基本式微寂灭了。直到600年后,欧洲传教士来华,才又有了翻译的兴盛。所以邹振环先生说:“翻译本身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居于边缘性的职位,离儒家的道统非常遥远。”^[41](P388)与传统儒家的仁义之道相比,翻译的确可谓是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李河先生分析认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发展迟缓,与一种实用化取向有关,它“窄化了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追问空间,耽搁了对翻译现象的深度理解”^[51](P71)。由此可见,基于儒学传统的强大影响力,翻译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并不容易。

(三) 走向解释学

显然,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翻译都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这可以从古代丰富典籍中找到相关的记载证据。相较于漫长远古的口译实践,人类大规模的笔译实践大概发生在公元2-3世纪,在中国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在西方则可以上溯到古罗马人对古希腊典籍的翻译。尽管

古人很早就把翻译当作一个讨论对象,但是,传统的翻译研究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感性的经验总结多,理性的哲学分析少。

综上所述,传统的翻译理论存在的问题有:第一,在思想观念上,或者持暴力翻译论,或者根本贬抑翻译。第二,认为翻译的中心任务在于实践、实训、技巧、技艺、操练、操作等,这是实用务实的事情;至于理论提炼和哲学反思则属于次要地位,这是谈玄务虚的事情。著名翻译家许钧先生指出:“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而‘翻译无理论’的说法至今在某些学者的脑中,仍有相当的市场。”^[6](P23)第三,即使偶有零散的翻译理论出现,也主要集中在翻译标准、翻译方法方面,只言片语,分析不详,理论深度不足。第四,这些翻译理论常常不可通约,因为它们从属于不同的翻译实践。例如,文学名著、科技文本、法律条文、哲学典籍、宗教圣书等的翻译实践要求不一样,翻译理论就不同,相互之间存在隔阂。第五,缺乏学科独立发展的意识。不得不说,由于缺乏哲学理论的观照,这极大地制约了人们对翻译的反思深度。朱建平先生认为:“翻译研究的最高层次应该是对翻译现象展开哲学思考。”^[7](P41)

从过去几十年世界翻译界的研究结果来看,翻译研究似乎必然会走向解释学。我国解释学研究权威洪汉鼎先生更是直接说:“诠释学在古代就可以说是一门关于理解、翻译和解释的学科,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门关于理解、翻译和解释的技艺学。”^[8](P3)古代西方的语文学经常用翻译和解释来给解释学下定义,这样一来,理解、翻译和解释就成为解释学中的新“三位一体”。

从常识来说,所谓翻译就是指把A语言转换成B语言,即语际翻译,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这是翻译的狭义定义。所谓解释学就是指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艺术。问题是:翻译为什么与解释学相关联?作为20世纪西方解释学浪潮的代表性哲学家,伽达默尔回答说:“因此每一个翻译都已经是解释(Auslegung),人们当然可以说,翻译总是解释的完成(Vollendung),是翻译者(Übersetzer)对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之完成。”^[9](P388)“每一个翻译者都是阐释者(Interpreter)。”^[9](P391)既然翻译即为解释,而解释学又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理论,那么翻译自然成为解释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出现克服了传统翻译理论的诸种不足,为翻译向哲学层次的跃升提供了理论论证和思想支撑。在伽达默尔看来,翻译绝不仅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偶然现象,它具有普遍必然的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西方解释学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施莱尔马赫提出了他的普遍解释学:由于误解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必然要建构一门普遍的解释学,从而超越文本的特殊性,超越理解方法和解释规则的分散性、特殊性、偶然性和从属性。按照利科的说法,施莱尔马赫使得部门解释学得以向普遍解释学飞跃,实现了西方解释学史上的第一次哥白尼革命。

同样,要让翻译实现一种哲学革命与理论飞跃,就必须积极借鉴现代理论成果,尤其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蕴藏的翻译思想。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对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海德格尔解释学思想的一次大综合。日本的河盛好藏甚至宣称:“没有误译的译文是根本不存在的。”^[10]既然误译是普遍的存在,那么我们也可以模仿上述解释学的那句著名格言说:“哪里有误译,哪里就有翻译解释学。”因此,我们需要一门超越于具体翻译操练活动之上具有普遍意义的翻译解释学。翻译问题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他的美国弟子帕尔默就鲜明地指出:“翻译现象是诠释学的真正核心。”^[11](P48)由此可见,从翻译走向解释学,不是回到一种技巧研究或建立一门部门解释学,而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观照翻译,提升人们对翻译理解的深度和层次。

二、翻译与解释学的本体论关联

翻译大家、哲学家贺麟先生主张:“所以要讨论翻译问题,我们首先要进一步讨论翻译所包含的哲学意义。”^[12](P522)要讨论翻译的哲学意义,必须先理清翻译的本体论(Ontology,又译为存在论)根据,因为本体论通常被认为是哲学中基础性最广、普遍性最强、理论最深刻、地位最崇高的部门。所谓本体,就

是指一切存在者的依托或根源,一切事物最初由它产生,并最终复归于它。由于本体超越了一切有形体之物与感官知觉之上,所以本体论又被归属于形而上学这门学科。在伽达默尔看来,解释学最初由翻译产生,并最终复归于它。因此,翻译与解释学有一种本体论关联。

第一,伽达默尔认为,翻译具有神话学的起源与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根基。他明确主张:“‘诠释学’的工作就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从神的世界转换到人的世界,从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的语言世界。”^[13](P109-110)简言之,解释学的工作就是把“神的话语”翻译成“人的话语”。在1968年的《古典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一文中,伽达默尔更是直接主张:解释学究其根本而言就是宣告、口译、阐明和解释的艺术,赫尔墨斯是神的信使,他把神的旨意传达给凡人^[13](P109)。

众所周知,以荷马与赫西俄德为代表的史诗神话是西方文化的源头。伽达默尔强调解释学起源于赫尔墨斯之神,而赫尔墨斯实质上就是诸神与人类之间的翻译者,因为神与人说着不同的话语。狄尔泰说:“在古希腊,对诗人的合乎技术的解释是由于教育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希腊启蒙时代,凡讲希腊语的地方,都流行对荷马和其他诗人进行解释和考证的理智游戏。”^[14](P78)狄尔泰把西方解释学回溯至“后荷马时代”(一个理解与解释荷马史诗的教化时代)。与此不同,伽达默尔把解释学溯源至“前荷马时代”(一个原始神话的文明初始时代),这比狄尔泰的工作要更深远。伽达默尔对解释学的神话学溯源有两大意义:一是表明翻译在西方文化根源上就与解释学相关联,而且翻译是一件高贵得连神都在做的主要工作,赫尔墨斯就是翻译之神。如此,伽达默尔就为翻译正名。二是呼应海德格尔的哲学存在论转向,使伽达默尔自己的哲学解释学也发生本体论革命,翻译也获得了一种本体论意义。其实早在1923年,海德格尔在授课中就提示:解释学与赫尔墨斯神即诸神的信使有关^[15](P9)。

从学科归属来说,本体论通常隶属于形而上学(Metaphysik)这门学科。因为本体论是形而上学中的核心部分,所以人们常常用本体论来指代形而上学。在古代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中,由于形而上学超越于感觉经验之上,因此又可以被称为神学。康德强调:“曾经有一个时候,形而上学被称为一切科学的女王。”^[16](序P1)在西方中世纪,形而上学就被等同于神学,神学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学科之上的学科之王。应该看到,伽达默尔强调翻译与解释学的神话学本体论关联,其要害在于超越翻译狭隘的技术主义路径,而不是想让解释学成为一门神学或神话学。因此,伽达默尔把解释学追溯到赫尔墨斯这位翻译之神,其旨趣并不是要进行一场浪漫主义的复辟倒退、反对启蒙,而是要表明翻译行为具有超越经验技术规则之上的普遍性、神圣性、根本性和奠基性。翻译成为人生在世的基本存在活动方式,它具有本体论的意蕴,而不能仅仅理解为某种偶然经验或技术规则。

第二,对伽达默尔而言,翻译在本质上是被理解者的意义在新的语言中开显出来的一种本体论行动。翻译绝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语际翻译),而且包括语内翻译、内心翻译、语物翻译、跨类翻译等,即广义的翻译。尤其在内在话语与外在话语的关系中,翻译是灵魂的摆渡者,占有本体地位。按照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逻辑,我们甚至可以说,人是从事翻译的动物,人的本质就在于人能进行翻译,从而使人自身能够自由出入不同的世界,创造出人类的文明。

伽达默尔指出:“翻译是内心的预见。”^[13](P246)通常,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心灵生活,它是灵魂、精神、思想和生命体验的纯粹活动,深不可测,无法直接看见听到,甚至有一种神秘感。笛卡尔把这称为“我思”,并由此提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从而开启西方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先河。伽达默尔则借用奥古斯丁的术语称之为“内在话语”(verbum interius),他说:“这种内在话语就是上帝话语的镜子和图像。”^[17](P592)与内在话语相对的则是外在话语,它包括口语和文字。如果我们用康德的术语来类比,那么内在话语就是物自体,外在话语则是现象。灵魂本体(内心)的意义需要通过外在话语来开显,本体与显现(现象)是统一的,用中国哲学来诠释这种情况即为体用不二;换言之,正是通过翻译这种存在论行动,被理解物(包括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意义在新的语言中被解开、被释放、被祛蔽、被显现出来了。因此,在伽达默尔这里,现象学、存在论、解释学与翻译学是统一的。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的

工作发现了心灵内的潜意识,他认为:“梦的工作是将梦念译为和象形文字相类似的原始的表示方式。”^[18](P180)既然做梦的机理就是把梦念翻译成各类形象,那么释梦就是一种“逆向翻译”的工作,即用语言把各类形象承载的梦念翻译出来。在德文中,动词 *übersetzen*(翻译)有摆渡、渡河之意。从伽达默尔的翻译理论来看,翻译先天地、内在地、普遍地寓于每一个人的心灵当中,它是灵魂的摆渡者。

在《解释篇》中,亚里士多德指出:“现在口语之音是灵魂中情感的符号,而书写标记则是口语之音的符号。”^[19](P25)用伽达默尔的语言来解释就是,口语是对灵魂情感(*affections of the soul*)的翻译,书写标记(*written marks*)则是对口语的翻译。因此,从灵魂到书写文字,这中间经历了双重的翻译或两趟摆渡。翻译摆渡的不是什么物件,而是心灵或精神。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心灵属于本体的存在,翻译要承载心灵本体的“重量”,因此翻译也化成本体的存在。斯坦纳甚至称:“真正的翻译是灵魂转世。”^[20](P270)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向来强调语言的本体论存在。在宗教教义中,灵魂通过转世得到升华;而在解释学中,语言就像一道光,事物则通过语言的翻译(光照)而得到本体论上的显现、存在、充实与升华。亚里士多德给人下了一个著名定义:人是逻各斯的动物。海德格尔则把这解释为:人是会说话的动物。如果像贝尔曼主张“说话就是翻译”^[21](P23),那么伽达默尔对人的本质定义则可以推论为:人是会翻译的动物。人之所以能超越于动物之上,就在于人能进行多种类型的翻译活动。可见,翻译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临时工具,用完即弃,而是人之为本体的存在。

第三,在伽达默尔看来,他的哲学解释学作为一种本体解释学和语言本体论,理解、解释、应用与翻译是统一的。通常意义上,单个人是无法生存的,人类需要通过与他人沟通和交流来达到自我保存。但是人类语言存在着本体论的差异,例如,内在话语与外在话语的差异、国家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地域方言之间的差异、古今语言的差异等,人类彼此语言不同,所以需要翻译。斯坦纳亦认为:“翻译因人类语言不同而存在。”^[20](P55)保守估计,地球上存在过两万多种语言,而人类目前正在使用的语言大概有四五千种之多。尤其在汉语里,就有“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的说法。据悉,释迦牟尼最早是用方言而不是用梵语来传播佛学的。伽达默尔严肃地指出:“人类的话语并不像神性的话语那样是唯一的,而必然是许多种话语。”^[17](P599)关于人类语言的本体论差异,为伽达默尔欣赏的赫尔德说得更为鲜明:“从严格的形而上的意义说,没有哪两个人的语言是完全相同的。”^[22](P108)这就为翻译的出场铺就了一条语言本体论的道路。

伽达默尔主张:“阅读已经是在进行翻译,而翻译则是再一次翻译。”^[23](P205)即阅读就是要把作者的话语翻译成为读者自己的话语;只有这样,读者才能真正理解作者,读懂文本。一般来说,伽达默尔主张理解、解释和应用是“三位一体”地统一在一起的,它们是同一个事情本身的三个不同阐释面向,但是此处还应该加上翻译。伽达默尔强调翻译要以理解为前提:“翻译总以完整理解陌生的语言,而且还以对被说出东西的本真含义的理解为先决条件。”^[23](P92)潘德荣先生对此的阐释是:“于翻译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根本不是如何选择合适的对应语词,而首先是对于文本的世界之理解。”^[24](P23)就像他的老师海德格尔主张那样,对伽达默尔而言,理解就是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翻译与理解、解释一样,都是人生在世的存在论活动。翻译与解释学天然结合在一起。

三、翻译与解释学的辩证法

自培根、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传统:方法决定知识;开创一门学科关键在于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建构;方法论与认识论合一。在伽达默尔思想中,辩证法是最核心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何卫平先生指出,伽达默尔用辩证法拯救了解释学,反过来也用解释学拯救了辩证法,使二者获得了新生^[25](P4)。由此可以推知,伽达默尔对翻译与解释学关系的认识处处都彰显着辩证法的精神,离开辩证法来谈翻译将不得要领。一般来说,辩证法就是要扬弃思想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两极对立,从而保持矛盾双方必要的张力或紧张关系。伽达默尔强调:“如果真有一种模式能说明理解中存在的紧张关系,

那么它就是翻译的模式。”^[131](P528)在伽达默尔的翻译理论中,同一与差异、忠实与自由、熟悉与陌生、他者与自我、异国与母邦、古代与现代、潜意识与显意识、生与死,等等,都存在一种辩证法的紧张关系。以正确的辩证方法处理好这些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卓越的认识。

第一,同一与差异的辩证法。伽达默尔说:“凡需要翻译的地方,就必须要考虑讲话者原本语词的精神和对复述的精神之间的距离。但这种距离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克服掉的。”^[17](P541)这种不可克服的距离表明了差异的真实存在。在翻译活动中,我们将原作与译作相比较发现,原作可以是同一的,译作则是差异的、变化的、多样的。面对同一个原作,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的译者给出的译作是不同的;即使同一个译者,面对同一个原作,不同时期的译作也会有差异。因此,张隆溪先生说,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承认意义和解释的多元论^[26](P255)。

然而,如果把差异强调到极端,则同一就是不可能的,进而理解与翻译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只有同一没有差异,那么翻译则是不必要的。这就是翻译中同一与差异的辩证法。显然,伽达默尔不是一位不可译主义者。人类的语言(外在话语)可以千差万别,但是语言所意指的对象、精神、意义(内在话语)却是同一的。贺麟先生认为:“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27]这就是翻译之所以可能的同一性基础。黑格尔指出:“真理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中,才是完全的,所以真理唯在于这种统一。”^[28](P33)因此,在翻译中,同一与差异是辩证统一的,这是一个真理,也是一个翻译的解释学方法论。

承认差异对翻译而言至关重要。无疑,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视域的差异,因此,译作绝不可能是原作的一个复印件。曹顺庆先生说:“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形式转换的过程,变异在其中如影随形。”^[29]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差异,离开同一性的引导,翻译将不成其为翻译。伽达默尔主张:“解释者和文本都有其各自的视域,所谓的理解就是这两个视域的融合。”^[31](P131)与理解相一致,翻译也是一个差异性的视域相互碰撞、融合、同一的过程。因此,一个译者必须考虑到自己视域与作者视域的差异,并寻求更宽广的视域来统一、统摄、综合这些差异,这个过程就叫做辩证法的扬弃(aufheben)。洪汉鼎先生说:“翻译典型地表现了视域融合过程。”^[30](P339)

第二,忠实与自由的辩证法。在一般意义上,人们常常强调翻译的首要方法论原则就是要忠于原著、原文、原话,但是这种常识也有其认识局限。伽达默尔更强调:“翻译这个事务因而总有某种程度的‘自由’。”^[23](P92)译者不是一个学舌的鹦鹉,而是一位具有自由能力的创造者;翻译总是自由的翻译。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反对那种不顾当下语境的硬译、直译或逐字翻译,而更偏向于意译、创造的翻译或自由的翻译,但不是乱译、胡译。早在1923年,本雅明就曾讲过类似的观点:“译者的职责就在于让那些被放逐到别的话语当中的纯语言在自己的语言中得以释放,还在于通过自己对原作的再创造,让被困的纯语言得以自由。”^[31](P67)为什么要赋予翻译自由?根据伽达默尔的分析,因为译者必须考虑到人类的语词不是单义性的,语言有一个自由摆动的意义空间;翻译也不是对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标准复制,而是一种再创造或重新塑造(Nachbildung)。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总是面临各种困难的选择,他既要考虑作者、原作,也要考虑读者与自己时代的需求,他必须在原作语言的自由空间与译作语言的自由空间中来回穿梭,寻找某种契合点,并作出恰当的决断。因此,伽达默尔说:“翻译真正的任务就在于‘有成效的传达’(ausrichten)某些事情。”^[31](P110)翻译,一般意味着信息或意义的跨语言传达要收到实效,让读者明白。反之,让读者读不懂、让听者听不明的翻译都不算好的翻译。

因此,伽达默尔甚至说:“每一次翻译就像一次背叛。”^[32](P279)为了避免死译、硬译,翻译就需要根据具体的处境或情况而突出重点,从而使得翻译有某种自由思考与选择的必要,这好像是一种背叛,但实质上最终实现了翻译达意的目的。当然,自由的翻译不是任意曲解的翻译,更不是想怎么译就怎么译,忠实或信实(Treue)仍然是翻译中不可或缺的制约性力量。译者的自由始终受到原作语言和自身处境的牵引和定向。伽达默尔辩证地说:“翻译者面对的是语言的文本,……他受到文本本身内容的束缚。”^[31](P183)可见,翻译本身是受到对象指引与规范的,它表现了解释学之中忠实与自由的辩证法。总

之,缺乏自由和忠实的翻译,译作都可能会成为没有思想内容的字母或不可理解的天书。

第三,陌生与熟悉的辩证法。伽达默尔辩证地强调:翻译的“优越性在于能把陌生的东西变成熟悉的东西,它并非只是批判地消除或非批判地复制陌生的东西,而是用自己的概念把陌生的东西置于自己的视野中,并使它重新起作用”^[131](P218)。翻译总是基于他者、异域、陌生、神秘、远古等世界的惊诧经验,它总是需要在异域与母邦、陌生与熟悉、神秘与平凡、古代与现代之间来回摆渡,力保均衡,不能顾此失彼、厚此薄彼。这就是翻译解释学中陌生与熟悉的辩证法。伽达默尔认为:“‘诠释’这事务却恰好在于把一种用陌生的或不可理解的方式表达的东西翻译成可理解的各种语言。”^[231](P92)换言之,翻译的任务就是解释学的任务,即把陌生的语言转化为熟悉的语言,把异域的世界转变为熟知的世界,把未能理解的东西转为可以理解的东西。陌生东西有时让人感到不舒适,熟悉东西则让人得心应手;异域风情有时让人感到怪异,母邦水土则让人习惯自然;神秘幽玄有时让人感到惊恐,平凡日常则让人舒服放心;远古时代有时让人感到蒙昧,现代生活则让人亲切安然。翻译在本质上就是化陌生为熟悉。海德格尔说:“翻译:使一种陌生的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能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理解,而且是为了这种理解。”^[151](P14)

翻译不能完全丢下陌生的东西不管,而只在自家熟悉的园地里兜圈子。伽达默尔说:“在翻译时,对外语的掌握只是一种前提条件。”^[131](P413)然而一些人根本不懂外语,也从来没有在异国他乡生活过,却也成为翻译大家。例如,林纾根本不通外语,却先后与人合作翻译小说180余种,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泰斗。显然,他的翻译属同一种语言内的翻译,即将他人的口语化翻译成果再度翻译成书面的文言文。懂外语即通晓陌生的语言,这是翻译的基本前提条件,但是伽达默尔并不满足于此,他特别强调理解一门语言(特别是外语)就是一种“生命的践行”(Lebensvollzug)^[91](P388)。因此,有在陌生的外语世界里生活的经验就是保障翻译质量的必经环节。严复懂外语,也有留洋生活经历,可是他的翻译刻意渊雅,文必推汉唐古代,崇古薄今、雅俗两立。他甚至宣称他的译作就是为了给那些多读中国古书的人准备的。可见严复不懂翻译的辩证法。

四、翻译与解释学的伦理学

译作是翻译直接的产品,但是翻译还有间接的产品,它能发挥不一样的价值效应,产生重大的现实意义。作为古代实践哲学的复兴者,伽达默尔是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实践哲学”这个词的,它包含着政治学、伦理学和经济学三个基本学科分支。法国当代翻译理论天才学者贝尔曼呼吁建立一门翻译伦理学,应该说受到了伽达默尔翻译解释学的启发。伽达默尔高屋建瓴地指出:“翻译的过程从根本上包括了人类理解世界与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231](P205)那么翻译中到底包括了什么样的秘密?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分析,翻译涵盖了谦逊、平等、对话、文明、教化、发展、和谐等世界和社会交往的核心价值。因此,在伽达默尔看来,翻译具有实践哲学尤其是伦理学的意蕴。

第一,谦逊是翻译的首要实践品格与伦理价值。人类为什么要翻译?恰恰是因为我们谦逊地意识到自身的不足,而另一种语言文化的他者可能比自我更优秀、更值得学习借鉴。翻译就是一种自我超越。伽达默尔说:“翻译会让他者的真理观点相对于自身而得到保存,从而使陌生的因素和自身的因素在一种新的形态中相互交流。”^[131](P218-219)《诗经》里的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说的是同样的道理。翻译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照见自我的缺陷。就此而言,翻译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自大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唯我独尊主义。一个坐井观天、孤芳自赏、夜郎自大的个人或民族通常不会意识到翻译的重大意义。刘云虹认为:“翻译伦理首先体现于译者对原作的信任,相信原作是一部言之有物的严肃作品,……同样,翻译伦理还体现于译者对原作的尊重。”^[331](P150)这同样是翻译的应有之义。

在古希腊特洛伊的浴血战场上,语言的杂乱与战争的纷乱一样相互交织。荷马用史诗描述道:“特洛伊人喊声嘈响,拥挤在宽长的队列里。他们没有一种共通的话语,共同的语言,故言谈杂乱无章。”^[341](P93)没有共同的语言,则容易导致战乱不止。《圣经·创世纪·巴别塔》中记载,全世界在一开始都只说一

种语言,只有一种共同的话语。后来人类用烘透的砖块代替石料来为自己建造一座城市,并且计划修建一座塔直通天堂,意图扬名立万,不再分隔一方。为此,耶和华惩罚了人类:他把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并且搅乱人类的语言,使他们彼此不能相互理解。所以,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就成为耶和华搅乱人类语言、散居人类的惩罚标记。值得注意的是,耶和华为了惩罚人类的骄傲自大,使用的最独特方式竟然是搅乱语言,使语言由一变多,人们只有不同的语言,没有共通的话语。因此,斯坦纳指出:“语言是外人的无声带,是产生割裂的刀锋。”^[20](P62)为了重新把人类和谐团结起来,翻译势在必行,翻译具有解释学伦理学的意义。

第二,翻译不是制造壁垒,而是沟通彼此,友爱相处。伽达默尔特别强调对话精神在翻译中的政治与伦理意义。他说,口译者就是通过自己的中间转换,从而使两个说陌生母语的人之间的口头谈话应该成为可能^[23](P153)。翻译的对话政治本质就在于强调暴力对抗不是人类的出路,只有和平协商才是人类的希望。因此,翻译应该有义务化干戈为玉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译者应该是人类和平的使者。

例如《周礼·秋官·象胥》记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可见在中国古代,翻译官(象胥)不仅有向各国使臣翻译传递王者话语的功能,而且还有与各国人民和睦相亲的政治意蕴。显然,所有这一切都奠基于翻译的友爱、联系与交往伦理功能。

翻译通常被视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伽达默尔说:“口译者处于操不同语言的讲话者之间,通过他的居中讲话把操不同语言的讲话人联系起来。”^[13](P423)在这里,翻译就是联系、交流、友爱与团结。凡是主张不可翻译的人,实质上就是一种自我封闭、不愿沟通交流的心态在作祟。斯坦纳也强调:“任何交流模式同时也都是翻译模式,是对意义的纵横传递。”^[20](P50)因此,翻译不仅互通有无,而且具有团结友爱、睦邻友邦的积极伦理意义。但凡需要翻译对话的地方,往往已经把平等预设为第一个前提条件了。

第三,翻译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促进文明的更新再造与民族的复兴发展。伽达默尔甚至奇特地主张:我们在翻译就是指,我们把某种死的东西翻译为一种“可以阅读的理解”的新实行^[23](P205)。简言之,翻译能够“起死回生”。歌德也说过:“一个好的翻译会让作品获得重生。”^[21](P85)作为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伽达默尔当然清楚西方文明的历史与翻译息息相关。文艺复兴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对往昔尘封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翻译运动。斯坦纳说:“翻译为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欧洲注入了能量。”^[20](P251)可见,西方古代的古典文明在翻译中重见天日、更新再造,是翻译让古代文化起死回生,是持续不断的翻译塑造了古希腊罗马教化的光辉形象。

同样,现代德语的诞生与翻译密切关联。黑格尔指出:“路德所译的《圣经》对于德意志民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35](P498)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路德对《圣经》的德语翻译,就不可能有现代德语乃至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如果没有现代德语,就不可能有现代德国的文化乃至哲学成就。这是一个翻译的时代:沃斯翻译荷马史诗,施莱尔马赫翻译柏拉图,维兰德、奥古斯特·施莱格尔翻译莎士比亚,蒂克翻译《堂吉珂德》,荷尔德林翻译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甚至歌德也是重要的翻译家。黑格尔赞扬沃尔夫是第一个使哲学在德国本土化的人,因为他是用德语在写作的;相反,他批评莱布尼茨作为一个德国人,却只懂得用拉丁文和法文来写作。在沃尔夫之前,哲学只会说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正如路德教会上帝说德语一样,是沃尔夫教会哲学说德语。因此,斯坦纳深刻地指出说:“翻译是德语本身‘最深处的命运’。”^[20](P269)

在翻译过程中,既不是消灭他者,也不是牺牲自我。因此,黑格尔主张:“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和思维的权利,同样属于解放的形式。”^[35](P53)“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思想应当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36](P187)可见在翻译中必须要注意到本民族语言的发展权利。只有通过翻译,某些学科或思想才

能在本国本民族中生根发芽、发展壮大。100多年前,梁启超就强调:“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37](P60)而这种对外来文化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就叫做启蒙,因此,翻译对人类精神的教化不可或缺。从历史上看,翻译往往成为启蒙新民、拯救国难、振兴民族、创新文化的重要途径。

五、结论

可以肯定,伽达默尔在综合了柏拉图的对话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黑格尔的辩证法、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的存在论之后,从解释学的角度把翻译提升到了哲学的理论高度。鉴于翻译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核心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伽达默尔建立了一门翻译哲学或翻译解释学。于是,我们尝试着把这门学说的建构逻辑大致上总结为:第一,我们要直面问题,破除传统观念施加在翻译上的末技论假象,上升到一门哲学意义上的翻译解释学。如果我们把翻译解释学比喻为一棵知识之树,那么破除翻译假象就成为它的丰厚土壤。第二,要确立翻译解释学的本体论依据。这是这棵知识之树的树根,是整个学说的基础。第三,需要从翻译方面着手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建构工作,它是翻译解释学的主干,也是这棵知识之树的树干。第四,凸显翻译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底蕴,它是这棵知识之树结出的丰硕果实。今天,翻译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学生的必修功课。这种普遍的翻译实践促使我们要进行哲学理论的反思。以上对伽达默尔翻译解释学的建构只是一个尝试方案而不是唯一的答案,其目的更多是想唤醒人们对翻译与解释学、翻译与哲学、翻译与文明进步等重大理论议题的关注与研究。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深刻地处在一个翻译的时代,翻译已经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刘军平认为:“有迹象表明西方翻译研究正在朝着‘认知转向’或‘哲学转向’(或批评理论转向)在悄悄来临。”^[38](P7)这个迹象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伽达默尔的翻译思想,它为一门翻译解释学的具体建构提供了绝好的例证。斯坦纳认为,本雅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影响使得对翻译和解读的解释学乃至形而上学研究得到了复兴。贝尔曼也强调,现在翻译已经成为哲学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文化领域引发了巨大的影响。只要认真阅读,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斯坦纳和贝尔曼的翻译理论都归属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路线。应该看到,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到斯坦纳、贝尔曼,他们构成了西方翻译理论的解释学流派。

参考文献

- [1] 单继刚. 翻译的哲学方面.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2] 尼采. 快乐的科学. 黄明嘉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3.
- [3] 杨全红. 翻译史另写.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 [4] 邹振环.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上海: 中西书局, 2017.
- [5] 李河. 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解释学视野中的翻译问题.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 [6] 许钧. 翻译论.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 [7] 朱健平. 翻译: 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
- [8] 洪汉鼎. 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9] 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86.
- [10] 河盛好藏. 正确对待误译. 刘多田译. 中国翻译, 1986, (3).
- [11] 理查德·E. 帕尔默. 诠释学. 潘德荣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2] 贺麟. 论翻译//罗新璋, 陈应年. 翻译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13]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诠释学II 真理与方法. 洪汉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14] 狄尔泰. 诠释学的起源//洪汉鼎. 理解与解释: 诠释学经典文选.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
- [15] 海德格尔. 存在论: 实际性的解释学. 何卫平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6]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7]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诠释学I 真理与方法. 洪汉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18]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 高觉敷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19] Jonathan Barnes.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20] 乔治·斯坦纳. 巴别塔之后: 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孟醒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 [21] 安托瓦纳·贝尔曼. 异域的考验: 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 章文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 [22] J. G. 赫尔德. 论语言的起源. 姚小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23] Hans-Georg Gadamer. *Hermeneutik II*.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3.
- [24] 潘德荣. 西方诠释学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25] 何卫平. 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 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26] 张隆溪. 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 [27] 贺麟. 谈谈翻译. 中国翻译, 1991, (1).
- [28] 黑格尔. 逻辑学: 下卷. 杨一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29] 曹顺庆. 翻译的变异: 世界文学未来何在. 中国科学报, 2019-01-23.
- [30] 洪汉鼎. 《真理与方法》解读.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31] 瓦尔特·本雅明. 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 李茂增、苏仲乐译. 北京: 东方出版中心, 2009.
- [32] Hans-Georg Gadamer. *Asthetik Und Poetik I Kunst als Aussage*. Tübingen: Mohr, 1993.
- [33] 刘云虹. 翻译批评研究.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34] 荷马. 伊利亚特. 陈中梅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4.
- [35]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86.
- [36]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4卷. 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37] 梁启超. 饮冰室文集: 1.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0.
- [38]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Translation and Hermeneutics

On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Gadamer

Huang Xiaozhou (Guangxi University)

Abstract Translation-related issue occupie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western hermeneutics. The emergence of Gadamer's hermeneutic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elev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o the philosophical level. Translation has its origin in mythology and is grounded in metaphysical ontology. Essentially, Translation is an ontological activity wherein the meaning of the understood is unfolded in a new language. In translation, there exists a dialectical tension between unity and difference, faithfulness and freedom, familiarity and strangeness, the other and the self, the foreign and the native, antiquity and modernity, subconsciousness and consciousness, life and death. Translation embraces core values of interaction such as humility, equality, dialogue, civilization, enlightenment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harmo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al ethics. Translation ofte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rescuing the nation from crisis, revitalizing the nation and innovating culture.

Key words translation; hermeneutics; dialectics; ethics

■ 作者简介 黄小洲,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广西 南宁 530004。

■ 责任编辑 涂文迁